整本书

# 放学去书店，实体书店燃起“烟火气”

**实体书店正在创造新的阅读场景。它们与周遭社区的人群发生频繁的联系，探索一种理想的社区、空间与居民之间的相处模式。**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稻城及所的“放学去书店”服务

北京，稻城及所，一家开在长安商场里的书店。某种程度上，它“生不逢时”，2019年年底开业，2020年年初就遇上了新冠肺炎疫情。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，“在成本的压力之下，在书店会员的提倡下”，书店开启了“放学去书店”的服务。

珠海，无界书店，一家开在住宅区里的书店。2020年1月，住宅区所在的前环社区成立了第一届居民委员会，从当年9月开始，书店和社区合作，陆续举办了各种“职业体验”的青少年公益活动。

说到书店，近些年与之关联的形容词往往是“文艺"网红”，到书店“打卡”更成为文艺青年的标配。然而，有那么一些书店，开始从“文艺范儿”走向“烟火气”，它们与周遭社区的人群发生频繁的联系，而书店的场景，也由此变得更加丰富。

## 书店还能做什么

“这本《美的常识》，应该放在艺术理论的书架吗？”拿着任务卡的小学生刘家畅看着高高的书架，自言自语。在她身边，还有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，在图书管理员组长的带领下认真工作。

今年3月，无界书店发布了两则“招聘启事”：一是无界书店的图书管理员4名，二是无界美术馆的展厅工作人员4名。工作职责写得明明白白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年龄下限“放宽”到12岁，上限到35岁。这些“毫无工作经验”的“图书管理员”在“无界职人”的体验中，学习图书出版、图书分类、信息检索、展览布局等知识。

无界文化总经理陈丞介绍，“无界职人”计划主要面向前环社区学生、居民。社区居委会和书店都希望通过活动，让居民以志愿者的身份报名参与社区公众服务，并通过这一活动探索一种理想的社区、空间与居民之间的相处模式。

稻城及所的经营者庄宁开了15年书店，“放学去书店”却是第一次完全基于用户需求定制的服务。这项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：下午3点半放学后，孩子们会由书店工作人员接到店中，休息一会儿后完成家庭作业，接下来是50分钟的阅读，吃完晚餐后，则是文化沙龙。

庄宁介绍，书店所在位置是小学学区，而小学生放学的时间和家长的工作时间是无法匹配的。因此不少书店会员提出，能否让书店帮助照顾放学后无处可去的孩子们。这是一项付费服务。

的确，稻城及所的“放学去书店”服务获得了经济效益。“基本支付了三分之二的房租，这也是书店在尝试了诸多自救方式后唯一成功的案例。”庄宁说。

书店适宜提供哪些有“烟火气”的服务？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院长刘京晶的建议“实事求是”，比如，开在写字楼里的书店，要满足上班族的诉求；开在住宅区的书店，就要满足家庭生活的需求。

## 是书店，更是空间

稻城及所的会员基本都住在附近，家长和孩子来书店，不仅是商家和顾客的关系，在庄宁看来，有时候这里像一个图书馆，店员像图书管理员，也像是孩子的家庭教师。

有一个二年级的男孩，父母都在外地工作，他由姥姥姥爷照顾。但二老都已经70多岁，只能顾及孩子的饮食起居，加之溺爱，和孩子在辅导功课和交流上有一定障碍。妈妈知道稻城及所有了“放学去书店”服务后，第一时间把孩子送来了。

经过几个月的相处，家长、孩子、书店三者之间都建立了信任关系。“孩子和其他小朋友相处得很好，写作业的时候终于不再趴在地上了。”庄宁说，“甚至有一次，孩子头发长了，爸爸妈妈又一直没时间回来，我想带他去理发。我觉得孩子是书店的孩子。”

前环社区的居民李娇是一个90后女孩，在珠海一所学校工作。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学校不能按时开学，李娇额外收获了一个漫长的假期。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无界文化的活动消息后，她连续参与了4场讲座、观展及读书分享活动。家门口的文化服务，激发了李娇的写作热情。根据讲座内容及自己的阅读清单，她和社区内一批志同道合的居民组建书友群，以书为媒，分享阅读带来的愉悦。

陈丞说，书店有“烟火气”，其实是让书店更有“书香”，这也是为书店“祛魅”的过程。书店是一个公共文化空间，就是要开拓新的阅读场景，让人们能在文化空间内感受一座城市的烟火气。

刘京晶说，当下的书店仍然分两类，一类是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公共书店（图书馆），另一类是民营书店。无论哪一种性质的书店，都在慢慢拓展自己的业务领域和经营范围，不仅有咖啡、文创、沙龙，还提供除了阅读之外的便民服务。

“坦白说，在互联网经济之下，很多书店确实无法仅靠书籍售卖来立足，实体书店闭店的消息时有传来。但人不可能永远活在网上，需要走到线下进行交流，这样书店作为文化空间的价值和作用就会凸显。”刘京晶说。

## 烟火气与很好的书和咖啡并不矛盾

在过去的十几年中，庄宁尝试了各种书店的形式。2014年，她在北京的金融街开过一家书店，办绘画、插花的沙龙，但没有任何面向青少年的服务，简言之，“非常文艺”；而稻城及所，更多回到书店的基础服务——阅读，且面向青少年。

“很多人觉得开书店是一种文艺情怀，那我们每天和放学的孩子在一起，进入了烟火人家，会不会丢了文艺？”庄宁说，“我其实也犹豫过，我做书店的初衷，只是做一家自己喜欢的书店。我不是一个妈妈，我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文艺女青年。”

后来，庄宁想明白了，书店的文艺属性是一种个人行为，而稻城及所是一家基于社区的书店。基于社区，意味着书店要面向“老、中、青、少”等各个年龄段的群体，大部分人是“文艺不起来”的。于是，她学会了一个道理，开书店要因地制宜，“个人喜好可以暂时放一放”。

但书店有烟火气，并不意味着这家书店没有很好的选书、没有很好的咖啡、没有很好的窗景——恰恰相反，庄宁希望，在青少年的成长阶段，在他们的父母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，他们在书店里能拥有温暖的回忆。庄宁反复跟家长们说，这不是一个“课后辅导”的地方，而是希望所有孩子在书店都是自由的，想坐着看书就坐着，想躺着就躺着，以喜欢的方式在这里度过几个小时的时光。

在刘京晶看来，独立书店在兴起之初主打“文艺”，是适应人们在满足了物质生活之后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更高要求，这其中包含了大众对审美的需求，所以书店在购买借阅等功能之外，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审美体验。

“当下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基层、在社区，都提倡服务职能的集中整合。书店作为其中一员，提供便民服务是特别正常的，符合国家对公共文化设施的要求——以人民为中心。”刘京晶说，“而民营书店从市场的角度考虑，通过便民服务来凝聚人气，成为社区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情感连接点。”

刘京晶曾在全国各地看到有书店提供24小时便民服务，比如，给环卫工人和晚归的人准备一碗热茶、一碗热面，还有一些书店成为志愿者的阵地，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，“书店可以更好地融入城市，书店的服务体现了城市的温度”。

以读书为主题的文化直播节目《一起上书房》，某一集讲过一个小故事：桂林，刀锋书店，有好多年了，经常有一个瘦小的老奶奶，提着一个巨大的包袱进来，坐在书架边，抽一本书开始看。店员起初不太愿意，因为她看上去“不太卫生”，但还是让她先洗个手，就任由她在书店一待大半天。

读完书，老奶奶背着包袱，出门，再次融入这座城市的人海中。她是一个来自农村的拾荒者，但在书店，她是一个阅读者。她说，来书店，能让自己平静。

**试想在这样的“街道”中穿行，两边除了书店没有其他，一家家书店招牌依次从眼前划过，该是什么心情？**

□ 韩浩月

在2021世界阅读日到来之前，书评人绿茶出版了厚厚的一本《如果没有书店》，里面提到了约200家书店的名字，名单列出来，会是长长的一串，这也可以视为绿茶走访书店的一份“成绩单。”

你为什么爱逛书店？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，答案可能有许多，买书，翻书，闲逛，喝咖啡……这是常见的答案，也是读者与书店之间看得见摸得着的联系，而《如果没有书店》这本书，则提供了人与书店建立关联的更多可能性。

读这本书，心里充满了安静与感动，整本书像一条“街道”，两边除了书店没有其他，试想在这样的“街道”中穿行，一家家书店招牌依次从眼前划过，该是什么心情？绿茶无意之间就“打造”了这条街道，他津津乐道，他兴高采烈，书店会让人得到太多的快乐。

阅读这本书，感觉中国的“书店文化”太繁荣了，每家书店都有自己的特色，每一位书店背后的老板，都有着专属于自己的故事，他们有着一股“劲往一处使”的劲头，在书店生存并不轻松的时代，把书店生意做成了情怀和文化。读完《如果没有书店》这本书，它刷新了我对中国民营书店的整体印象，觉得城市中能散落着这些书店，实在是一件令人感到鼓舞的事情。

绿茶的写作与记录，绝不是仅仅提供一份书店地图，他的文章里，大篇幅是对人的刻画与描写，他写到的人，有的是书店老板，有的是当地的文化人，还有形形色色的读者，这些面孔被集合在一本书中的时候，形成了一个集体的面庞画像，这张画像上的表情是沉静的、柔软的、投入的，这是书店气质的很重要的一个呈现。

中国书店之多、之美、之个性十足，已是很多人都认同的现象了，但关于书店的故事，还是少了些，绿茶这次就是担当起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角色，他在书中一直用娓娓道来的口吻在讲书店故事，谈自己曾寄予深厚感情的风入松与读易洞，谈桂林纸的时代“住在书店”，谈泉州风雅颂，谈苏州慢书房……虽然情节不曲折，但总是能让读者觉得他谈得很丰满，这是因为，他所呈现的书店故事是立体的，除了书香之外，还富有人的气息与味道。

绿茶说到，一家可以住宿的书店，将一把钥匙交给房客，书店打烊之后，住客就可以用这把钥匙进入书店，整个书店在那一刻，会成为他一个人的空间开阔的书店，在午夜也不显寂寞，那些大师们写出的诸多经典著作，在一排排高大的书架上，等待此刻唯一的读者伸出他虔诚的手……这样的书店故事，虽然简单却具有非凡的张力。

今年读书日，山东有一列绿皮火车缓慢上路了，其中一节车厢被做成了书店，这大概是国内第一个会移动的书店，能够在乘火车慢节奏的旅行当中，进入书店车厢翻翻书，这情形真是令人向往。这让我想起一本名字叫《小小巴黎书店》的畅销书，这本书讲的是塞纳河上一条船装满了书起航，这个船上书店承载了主人的情感故事，每次停靠岸边也吸引了好奇的读者，书写得有些伤感，但船上书店本身所带有的浪漫色彩，又使得这伤感被淡化许多，成了一种唯美。

要是每一家书店能都像火车书店和船上书店这样，能给人带来丰富的想象空间，那么书店的意义与价值将拓宽许多，书店将不再是渠道与平台，而成为人们的情感与精神寄托。我相信，即便城市里再普通平凡的一家书店，也会有一个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动人故事，这样的故事，会给干巴枯燥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丰润的气息。

如果没有书店，未来城市的赛博朋克色彩会更浓厚一些吧。在我们大脑所想象的画面当中，假若将来的生活被消费欲、智能化、脑机接口等变得更加机械的时候，如果每条街道能够有一家书店伫立在那里，那幅画面会不会立刻柔和许多？《如果没有书店》这个书名，其实已经很明白地表明立场：无论现在还是将来，都不可能没有书店。

如果书店“长满”了故事，那么书店就会顽强地成为我们生活场景中的一条“大动脉”，可以感受它的跳动，并且坚定地相信它的温度与活力会持久存在。

专 访

# 陈冲：我想叙述的欲望来自生命本身

陈 冲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

2020年年初，新冠肺炎疫情刚暴发的时候，很多新闻画面给陈冲带来巨大冲击，比如忙碌的医院，空旷的街道。陈冲产生一股冲动，想拍点东西记录这场疫情，但还是觉得应该再沉淀一下，感受一下，体验这场灾难对人类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。

电影《世间有她》闯进了陈冲的生活。“当我思考疫情主题已经几个月时，

**“我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学习的弧度、成长的弧度，能够去经历一些新的事情，这也是我继续工作的动力——挖掘一下以前没有看到的自己”。**

《世间有她》总制片人董文洁跟我联系，说她有一个想法，要让3位女性导演来讲3个以疫情为时代背景的故事，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想讲的故事。”

“短片能够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去实现你的想法。”接受本报记者专访，陈冲说，她接到邀请后“马上就同意了”，立即着手研究资料、积累素材、写剧本。

在《世间有她》中，陈冲创作的单元，讲述了一对被放逐两地的恋人的故事，也是一个“女孩和手机的故事”。她希望用一种时尚新潮的电影语言，讲述一个古老的主题——“放逐、爱和失去，这是人类跟传染病毒斗争中常出现的主题”。

陈冲形容创作《世间有她》的单元短片，仿佛是写一首诗歌，“要用充满诗性的视觉来表达一个很现实的故事”。当她找到了用黑白和彩色相结合的视觉表达形式时，整个人特别兴奋。

陈冲认为，我们没有能力选择要表达的主题，主题是生命所赋予的，“主动选择了你”。“为什么有些事件对你的触动比另外一些事件更深呢？这是你的生活经历所决定的。生命赋予了你这些故事，你想叙述的欲望来自生命本身”。

无论是做演员还是做导演，在陈冲看来，如果人生只做轻而易举的事，没有很大意思。“我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学习的弧度、成长的弧度，能够去经历一些新的事情，这也是我继续工作的动力——挖掘一下以前没有看到的自己。”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《世间有她》的主题是爱和治愈。经过这一年，大家对爱会产生哪些新的理解？

陈冲：我们会更关注爱，关注生命。我们经历了一场灾难，突然被提醒生命可以这样脆弱，又可以这样坚韧，而坚韧是因为爱。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，我们会更关注生命本身。我希望观众从电影院走出来的时候会更热爱生命，拥抱生命，更珍惜跟你牵手同去看电影的这个人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回顾自己执导筒一路走来的路程，有没有经历过迷茫期？

陈冲：我永远都是困惑的。其实自己要做的事情，就是为了回答一些自己提的问题。我不明白的东西，会更关注它，所以当导演也是为了解答自己身上的疑惑。创作，不仅是对一个故事里的人物进行探索，也是对自己内心的探索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作为导演你一直很清楚自己要讲什么样的故事，什么驱使你一直保持这种旺盛的创造力？

陈冲：也许外人看来是这样，其实我在过自己的日子。我也有很多挣扎，很多疑惑。我想我的力量是来自于这些挣扎和疑惑，我总是在怀疑自己。我有很多的不安全感，要让自己更安全起来，我不停地想去吸收，想去阅读，想去探索世界、懂得世界，所以我自己的迷茫本身是给予我力量的。

不停地感受到困惑，不停地希望解决这些困惑。你想追求真理，但肯定无法真正地把真理握在手上，因为某一刻可能它又被推翻了。不停地去接近它本身是一种幸福，是最好的状态，它会给你力量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你认为女导演的发展会有一定阻力吗？阻力在哪儿？

陈冲：从数量上来说，女导演肯定比男导演少。比如在有孩子的家庭里，父亲去出差，只要母亲还在，还是相对完整的。母亲一下子不见了，好像这个家庭的孩子就会有缺陷。作为妻子和母亲，她的社会和专业的角色，对她的要求和压力更大一些。

很多人对女性本身有误解，觉得女性导演都是导文艺片、爱情片。好莱坞导演凯瑟琳·毕格罗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的那部电影《拆弹部队》，就是一个很男性化的题材。所以女导演跟女导演也有很大不同，我们被归类了以后，可能会有机会上的一种限制。但路都是人走出来的，我相信若有特别想讲的故事，你就会把它讲出来的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平时阅读习惯是怎样的？过去一年读了哪些书？

陈冲：我经常重温以前喜欢的书，因为我觉得它们值得，我可以在不同的阶段吸取到不同的养料。同时我也会去挖掘新的“旧书”。去年我觉得印象深的，非常享受的阅读体验，是读李碧华写的一本纪实文学《烟花三月》，这本书给我带来的震动和满足感都是很好的。我很喜欢的一本新书是陈春成的《夜晚的潜水艇》。约翰·伯格的《我们在此相遇》，我也很喜欢。

我蛮喜欢在火车上阅读的，没有其他地方可去，你可以在几个小时里完整地阅读。我出门的时候包里一定会有一本书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你之前说，对自己的要求已经不满足于做好演员、好导演，而是想让现代艺术变得更好，为什么有这样的目标？

陈冲：艺术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困扰和威胁。艺术一度是属于灵魂的东西，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。渐渐地，所有的才华、力量、资金、兴趣都投入到了高科技中，人文受到了忽略和威胁。商业上的价格，变成了艺术的标准。在这种前提下，创作者应该怎样继续保持创作的冲动，不要被打扰，是我想关注的问题。

说到创作的开始，法国那个山洞里发现的最早的壁画，它没有任何商业性，它是一个冲动，是人类心里想做的、想表达的。人类把它画了出来，是一种释放，这就是我们的初衷。我们所想要讲的故事是从那里来的，而不是金钱、商业所能够控制的，所以我说要让现代艺术变得更好，其实是想要在自己有限的能力之下，去保护原创的冲动和艺术本身的初衷。

人 物

# 编剧全勇先：从《悬崖》到《悬崖之上》

**对编剧全勇先来说，电影《悬崖之上》的创作过程，是一次弥补遗憾的过程。**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吴晓东

“《悬崖之上》保留了《悬崖》里面的人物关系，同时又编织了全新的故事，应该说是《悬崖》的前传。”对编剧全勇先来说，电影《悬崖之上》的创作过程，是一次弥补遗憾的过程。

9年前在谍战剧《悬崖》的最后一集，张嘉益饰演的男一号中共谍报人员周乙和女儿莎莎伤感诀别后，在漫天风雪中被敌人枪杀，英勇地倒在了黎明之前。这个结局成了很多观众心中的痛，直到今天都无法接受，尤其是最后的画面里周乙身中3枪，双手扶墙，慢慢倒地，这样的牺牲看起来并不壮烈。

就连编剧全勇先也对周乙的死“感到万分遗憾”。全勇先曾写下很长一段文字来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，为“开年大戏，只能把一个残缺的故事呈现在观众面前”而道歉，直言《悬崖》是个“根本就没说完的故事”，认为“周乙死得太窝囊了，太不值了”。

既然英雄已死，不能复活，那为什么时间不可以倒流，把故事往前讲？

电影《悬崖之上》背景设置在20世纪30年代的哈尔滨，讲述为保护“日本展开反人类实验”的人证，4位曾在苏联接受特训的中共谍报人员组成小队，回国执行代号为“乌特拉”的秘密行动。由于叛徒出卖，他们从跳伞降落的第一刻起，就已置身于敌人布下的罗网之中，而一项更严峻的任务已经摆在周乙的面前……

从《悬崖》到《悬崖之上》，中共谍报人员周乙由张嘉益变成了于和伟，特务头子高彬由程煜变成了倪大红，不变的是，两人表面上看起来是配合默契的上下级关系，暗地里依旧是波涛汹涌。老辣阴险的高彬生性多疑，每时每刻都在给周乙设计试探，巧妙应对一场又一场考试就成了周乙的生活日常。

全勇先出生在黑龙江，对那个年代发生在那片黑土地上的故事特别着迷，翻阅了大量有关东北抗联时期、东北14年抗战的历史资料之后，太多的感人故事对全勇先触动很大，它们似乎正在被今天的人们慢慢遗忘，反映这类题材的影视作品也不多。一个契机，给全勇先提供了把“悬崖”故事讲下去的机会。

那是发生在中马城的一次人质脱逃事件。当时日本人把用来做细菌实验的中国人圈在一个叫中马城的地方，后来发生了一次成功的越狱，逃出来十几个人，日本人围追堵截，把大部分人都抓住处死了，只有一个人幸存下来，这就是《悬崖之上》中“乌特拉”秘密行动护送的对象。

以这个史实为背景，全勇先让周乙“复活”了。

当年在全勇先看来“虎头蛇尾”的大结局，并没有影响到《悬崖》对各大奖项和观众口碑的一路收割。豆瓣上，《悬崖》现在的评分是8.4，张嘉益、宋佳两位主演一直火到现在。《悬崖》在2012年横扫白玉兰奖、金鹰奖等多个奖项，和《潜伏》《黎明之前》等，至今仍是观众心中的谍战剧经典。而张艺谋的首部谍战片，也盯上了“悬崖”。

2020年5月19日，全勇先发文透露《悬崖之上》杀青，他写道：“今天是《悬崖之上》杀青的日子，也是我刚刚获得自由的日子。这部电影拍了159天，张导带领全体剧组人员经历两次14天的隔离，真是历尽千辛万苦。感激之情，无以言表，拍照留念。”

谈到这次和张艺谋的合作，全勇先总结，电视剧《悬崖》可以说是编剧的艺术，电影《悬崖之上》却更像导演的艺术，“我剧本写了两稿就给他了，怎么视觉化、怎么用视听语言阐述这个故事，是导演要表达的东西。”全勇先说，张艺谋导演首先是个视觉大师，所以在整个故事表达上，他的视听语言是一流的，“影片中还原老哈尔滨的街景，当时人物的服饰、家居摆设都非常考究、非常真实”。

给全勇先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张艺谋拍戏的认真劲儿。一次他去剧组探班，当时为了拍一个空镜头足足等了一两个小时，张艺谋和大家一起等大风过来，还亲自爬到架子上，“当时真的很担心，他也是年近70的老人了”。

《悬崖之上》里一水儿的老戏骨，都是摸爬滚打历练出来的。张译、于和伟、秦海璐、朱亚文、倪大红、李乃文、雷佳音的演员阵容，不仅让人感受到十足的“谍战气息”，也展现出了血雨腥风年代英烈们的儿女情长、骨肉情深，“片中寻找失散孩子的故事虽然篇幅不多，却是催人泪下”。

影片中，众戏骨以不同姿态林立出场，呈现雪掩杀机下的群像对决。这其中，有为信仰奔走的坚定、甘愿牺牲的勇敢、保全自我的叛变等等，正邪两方阵营斗智交锋，在敌我难辨相互猜忌的过程中，其背后的人性博弈也逐渐浮显，这是导演张艺谋在谍战背后想要探讨的核心主题。

“我写谍战戏最关注的是人，人物是最有魅力的。”全勇先常常把人物关系放在谍战氛围里去表现。“如果观众对这个人物建立了兴趣，建立了情感，这个人物的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都会牵动观众的情绪。”

全勇先说，《悬崖之上》和普通的谍战片还有一些区别，除了敌我阵营的明暗交锋，电影对人的复杂性、人在极端情况下的反应、绝境之中的遭遇等都有较深的刻画。而且电影中人物较多，这也无疑为剧本创作增加了难度。

“那个年代的英烈跟我们现在想象的有很大不同，比如赵一曼，富裕人家出生，受过高等教育，但为了信仰，她放弃了优越的生活，钻进冰天雪地的深山老林里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。”全勇先说，冷云、赵尚志也一样并不是生活贫苦，但为了民族尊严和自己的理想，他们付出了很多甚至生命，“影片里我要尽量去还原那个时代，还原那群人”。